



钟天纬

晚清思想家、教育家、洋务人士钟天纬,1840年出生于松江府华亭县,1900年病逝。他自幼失学,33岁始入上海方言馆。1880年春,由李凤苞招募赴德,有机会考察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探求中西强弱不同之根源。他所撰写的时务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钟天纬与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徐建寅、经元善等多有交往,尤其与著名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交往甚密。尽管盛宣怀比钟天纬小四岁,但钟天纬还是以“师”相称。《钟天纬集》收录的与盛宣怀往来信函七十余通,反映了他们自1888年至1900年十余年间的交往历史,不乏稀有人知之事,对于深入研究盛宣怀以及清末洋务具有一定价值。

### 初识盛宣怀

钟天纬因病从德国返沪后,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傅兰雅等合作翻译西书。1887年,上任不久的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海关监督盛宣怀,被王韬邀请为当年夏季课程命题。盛道以自己经营的轮船和电报两项洋务大事策问考生,题目为《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筹划方持久论》。钟天纬在答卷中阐述当前轮船之弊八端及电报之弊四端,详细提出剔弊之方,深得盛宣怀赏识,被评定为超等第一名。由此,盛宣怀特意邀请钟天纬专程赴烟台,促膝面谈,深



劳费尔

### 一、劳费尔其人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美国汉学先驱,亚洲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他和法国的伯希和被公认为是知识最渊博、成果最丰硕的西方汉学家。1898年,劳费尔去美国,在人类学家鲍厄士(Franz Boas)指导下,参加了杰苏普北太平洋考察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前往东北部的萨哈林岛(Saghalin,即库页岛)和阿姆尔河(Amur,即黑龙江)地区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历时约一年(1898—1899)。劳费尔在鲍厄士的指导下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秉持人类学家调查异文化的立场,收集“能够充分反映和解释当地部落的日常生活、渔猎活动、社会组织形式、宗教信仰(萨满教)及巫术等社会内容的物品”。

鲍厄士当是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学革命,他不满于文化进化论及其指导下的博物馆展品陈列将各种文化按照发展程度线性排列。鲍厄士希望每个文化有一个独立的展厅,展示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呈现与研究一个文化特有的物件(artifact),窥得人们的社会(social)、宗教(religious)、农业(agricultural)以及工业(industrial)生活。为了重新布展,需要解决博物馆馆藏的不足,于是有了科学考察(scientific investigation)的想法。中国文化的复杂和精致程度足以给进化论者当头一棒,所以鲍厄士把眼光投向中国。

1901年3月,劳费尔正式接受了鲍厄士所在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人类学部的邀请,准备开始对中国的科学考察。1901年7月至1904年,劳费尔率领福探险

入探讨盛宣怀所关切的洋务事宜。盛宣怀交代钟天纬一系列事务,大大小小约有七八起。

首要事务是筹办烟台矿务学堂。矿务事业是盛宣怀早就认定的一项重要事业,十多年前即在湖北开采煤铁。由于失败,深知寻觅洋矿师及培养矿务人才是重中之重。他在钟天纬答卷中批示:“鄙人志在设一商船学堂,更欲设一矿务学堂,作者有心能条陈其西例,以备参酌定章否?”在钟天纬等协助下,盛宣怀拟定《拟请四省合试办矿务学堂酌拟章程》,议由北洋、南洋、两广、山东等四处督抚合力举办,每处每年各出经费1.5万两,共计银每年6万两,校址设烟台。盛宣怀一面请驻外公使参赞物色头等洋矿师;一面任钟天纬为矿务学堂监督,并进行筹备,包括聘请洋矿师和矿务洋教习,推荐中西学各教习,招考学生。钟天纬几经周折,反复分析性价比,最终排除英、美矿师,选定比利时矿师乃乃富。还推荐徐华封等8名中西学、算学、文案等中方教习,同时登报招考学生。由于与李鸿章欲将矿务学堂办在天津的意愿不合,迟迟不予批复,烟台矿务学堂暂时搁浅。

第二是铸造银币。盛宣怀交代钟天纬两件事,一是收集西方有关铸造银币的资料并翻译;二是组织设计银币样稿。对于钟天纬来说,原本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铸钱工艺》一书的计划,且考察过西方相关企业,收集西方铸造银币资料是驾轻就熟的。对于设计银币样稿,钟天纬花费了很多精力。他邀请吴友如等沪上著名画家,精心设计,反复修改,各环节均一一详细向盛宣怀请示汇报,最终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盛宣怀将设计图稿呈送李鸿章,李鸿章寄电曰:“银洋钱花纹甚佳。此事造端宏大……得人尤难,钢模应缓制。”盛宣怀委托钟天纬

制钱币事宜随即中止。

### 受荐入幕张府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修筑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以贯通南北。朝廷准奏,并调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以利主持铁路南段建设。张之洞与富有开矿经验的盛宣怀约定,赴任途中在上海见面,商讨开矿及开办铁厂事宜。盛宣怀从烟台专程南下,与张之洞商讨有关事务以外,推荐钟天纬入张之洞幕府。1890年初,钟天纬完成盛宣怀委托的在徐州利国的估矿任务以后,即赴湖北。

盛宣怀向张之洞举荐钟天纬,固然是为钟天纬获得重用创造条件,但也不排除有某种个人目的。但是,钟天纬作为李鸿章心腹盛宣怀的亲信,不可能得到张之洞的信任。在湖北的几年里,除了参与勘矿、筹办矿务学堂等事务外,一些关键性的岗位是轮不到钟天纬的,即使文案一职,地位也在三四位。在湖北期间,钟天纬隔三差五向盛宣怀汇报湖北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正是盛宣怀急于了解的。

汉阳铁厂的选址问题,是盛宣怀与张之洞主张不同的焦点之一。盛宣怀主张铁厂应设在大冶黄石港,主要理由是大冶有铁矿,从成本角度说是有利的;张之洞主张设在省城汉阳,主要理由是便于管理。盛与张分别从经济成本与企业管理角度坚持各自主张。冠冕堂皇,似乎都站得住脚,但是否还有深层的原因?钟天纬身在局中,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内情。他从用人角度分析张之洞坚持将铁厂设在汉阳的根本原因。他给盛宣怀信中写道:“尚有一层未言之隐”,张之洞“用人不过亲信数人”,“如徐仲虎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后来,铁厂设汉阳已是大势所趋,钟天纬

对盛宣怀说:“嗣后吾师来信可勿提此节矣。”

经营管理问题也是盛宣怀和张之洞分歧的焦点。盛宣怀主张官督商办,张之洞主张官办。盛宣怀对湖北的经营管理是十分关注的。钟天纬向盛宣怀反映了张之洞管理方面的不少问题:如不注意轻重缓急,“尚比之裁衣,先缝缝工满堂,而布帛犹未具,先急于办刀剪、针线之类”,“一切用料、用人,皆未计及也”;再如在用款方面大手大脚,入不敷出,最终还是走招商引资、官督商办之路。钟天纬将《汉阳铁厂官督商办章程》全文抄呈盛宣怀,以供参考。对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状况,钟天纬认为,要扭转局面,“非吾师莫属”。

钟天纬在湖北始始终得不到重用,多次去信盛宣怀,希望能另找出路,并在入张幕三年后,终于辞职返乡。

### 天津之行

钟天纬从湖北辞职返沪以后,盛宣怀即将钟天纬荐往天津,这或许有便于接触李鸿章之意。果然,经推荐,钟天纬随同李鸿章在渤海湾校阅海军,前后20余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海军校阅,一切顺利,大获成功。李鸿章特意向皇上汇报,并为有功人员保奖。眼看钟天纬有被李鸿章重用的机会,却因甲午战起而成泡影。

甲午战争打响之时,钟天纬便写了《上李傅相条陈日本兵事》一文,阐明“以战为守”观点,向李鸿章献计献策,分析日军可能采用的战略并提出对策措施。随着战争不断升级,钟天纬接二连三上书分析战数人”,“如徐仲虎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后来,铁厂设汉阳已是大势所趋,钟天纬

善,“请先生约严佑之、谢缓之诸君,合志并力,布告宇内,共筹义饷,兴义兵”。由于议和风声骤起,加之意见不一,募捐事宜搁浅。

甲午战争以后,各级官员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何去何从?具有远见的盛宣怀,委托钟天纬起草富强之道的文件,以备进呈。钟天纬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储人才”“裕国用”“商务”“练军”四方面十四篇文章,后来又经多次补充,共三十篇。1896年10月,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议折》进呈皇帝。这个奏折主要陈述三方面问题,一是“练兵之要”,二是“理财之要”,三是“育才之要”。从标题看,内容不出钟天纬代拟稿的范围。

### 创办三等学堂

1895年初夏,钟天纬和约已签,大局已定,便从天津告假回沪。年底,经元善、钟天纬等二十余人共同商议成立“同仁公济堂”,联约同志,救济贫民。由于身体原因,经元善无力主持,一切用人行政,由钟天纬总理。钟天纬的观点是:“养活数百万灾民,无救于中国之灭亡;培植成数十辈英才,总可以有裨大局也。”所以,钟天纬将其他事务一一分派他人,自己专心举办“义塾”。这一举动,引起党内强烈反响,意见纷纷,主要矛盾集中在报,并为有功人员保奖。眼看钟天纬有被李鸿章重用的机会,却因甲午战起而成泡影。

甲午战争打响之时,钟天纬便写了《上李傅相条陈日本兵事》一文,阐明“以战为守”观点,向李鸿章献计献策,分析日军可能采用的战略并提出对策措施。随着战争不断升级,钟天纬接二连三上书分析战数人”,“如徐仲虎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后来,铁厂设汉阳已是大势所趋,钟天纬

## 博物学家劳费尔及其《中国古玉》

■朱渊清

队(Jacob H.Schiff Expedition)到中国上海、南京、汉口、西安、北京、山东等地进行考察。此行的目的就是就一些文化和历史问题在中国进行调查探索和寻求文献文物,并获取人种学的一些资料和信息。这次考察由美国的席福(Jacob Henry Schiff)资助。在这次考察中,劳费尔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一大批汉代陶器和玉器。这次收集的藏品大约10000件,还有一些书籍、摹拓本、照片等(班内特·布朗逊《汉学家劳费尔与中国》,《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费尔对于中国的陶器、玉器很有研究,在搜集品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汉代的陶器》《中国古玉》等若干种研究专著。

1905年至1907年,劳费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任教,此后他还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委托在中国访古,劳费尔后来还作为美国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和约翰·克勒拉图书馆(The John Crerar Library)收集了丰富的汉文书籍和手稿。1908年,劳费尔受邀赴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任职,在此工作直到去世。1908—1910年,劳费尔组织和领导了布莱克斯通考察队(Blackstone Expedition),对西藏和西北藏区进行考察,还考察了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新疆等省,并为博物馆购买藏品。1923年,劳费尔率领马歇尔·菲尔德探险队(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再次前往中国考察,为期半年,主要是奔走上海和北京两地,与一些大的古董商和艺术品收藏家如福开森、李鸿章的侄孙李国经等交往密切,买了大量古董。

### 二、劳费尔在中国的工作

在鲍厄士的直接指导下,劳费尔开始了收集中国和亚洲古代文明的文物器物的漫长历程。劳费尔将他的收集品分为两类:工业制品和社会生活用品。1904年7月8日,劳费尔给鲍厄士信(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2, pp146—147.)中罗列道:

- 1 工业制品;
- 1) 纺织品:棉花、夏布、丝绸、纱布、锦纱、缎子、天鹅绒等;
- 2) 木工业和编织品;

- 3) 农业和食品;
- 4) 化工产品:如染料、肥皂、香、香水、粉饼、胭脂、股水和药品等;
- 5) 竹子和藤条制品、木雕品、银嵌木;
- 6) 棕榈纤维品、稻草、大麻、纯索;……(编按:此处引文有删节)
- 2 社会生活用品:
- 1) 服饰:成衣和鞋子;
- 2) 用于身体装饰的铜、银饰品、头饰;
- 3) 卫生器具;
- 4) 厨房用具;
- 5) 家具;
- 6) 炉灶和其他的加热工具;……(编按:此处引文有删节)

这个雄心勃勃的收集计划,广涉人类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劳费尔丰富无限的学术兴趣。接受过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德国历史语言学十年的考据训练,拥有人类学广阔视野并参加了鲍厄士指导的新型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得到长期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藏品的难得机缘,劳费尔成长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

劳费尔毕生为美国的博物馆收集了大约19,000件考古、历史和人类学物品。这些物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至1890年。其中包括大约7500块拓片,400个石器和玻璃器皿,130个犀牛角杯,500个木偶,1000枚硬币,1000件玉雕,1500件民间刺绣,30个早期铸铁物品,500件道教和佛教雕塑,400件汉朝陶器,230件锡制物品,300多件印刷品和招贴,以及300件与宠物(主要是鸽子和蟋蟀)相关的设备。(班内特·布朗逊《汉学家劳费尔与中国》,《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

劳费尔也渐趋积极地进入到中国本土的文化艺术的里。1903年6月12日劳费尔给鲍厄士信所附第二则备忘录(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2, pp101.)写道:

在夏德教授1902年12月29日写于我的信中,指示让我收集一位有独创性艺术家的画作,这个人叫闵闰,约一个世纪前居住在汉口。“他是中国极少的画家之一”,夏德教授写道,“他的作品泄露了他的幽默天赋,在这方面,他与他的一些日本同僚相似。作为中国艺术史代表人物,他的传记充满传奇色

彩”。在我收集过程中,我成功获得两件他的两件作品,均是在南京收集的。

闵闰是清朝中期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特别有性格的画家。劳费尔在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夏德的指导下,也能欣赏文人画了。劳费尔收集到的最珍贵的绘画作品是宋《耕织图》(1210.A.D.),这件珍品1928年从纽伯里图书馆转移到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劳费尔自己对拓片做过分类。据劳费尔1904年7月8日给鲍厄士信,其中包括喇嘛教碑文、伊斯兰教碑文、犹太教碑文、孔子纪念碑、山东地区汉代的雕刻、陕西和山西地区汉代和六朝时期的历史雕刻、佛教雕刻、基督教碑文等。劳费尔特别关注非汉文、非汉族、非儒家文化的铭刻。另外,有些石刻原石也被劳费尔运到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如《唐故陇西李让娘墓志铭并序》,《全唐文》没有收入。(陈章灿《拓本聚珠——芝加哥富地博物馆藏中国石刻拓本论述》,《中国文化》2012年秋之卷)

劳费尔最终收集到了很多最珍贵的中国文物。在西安,劳费尔花了很大精力和大量时间买到一件商代青铜鼎。1910年3月16日劳费尔给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费德里克写信(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3, pp437.)汇报:

这是一件大型商代的青铜鼎,它应该是早于公元前2000年,因此,约有4000年历史。它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年代久远,还因为它精致、华丽的工艺。它高64厘米,鼎外部周身都布满了纹饰,其纹饰部分是凸出的,部分是凹陷的,在鼎内部还有凸出的铭文,这是中国最早期的书写形式。……这是我见过的那个年代青铜器中最好器物,包括意大利的青铜器,我已经参观过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罗浮宫、意大利博物馆等博物馆这方面的藏品,这件青铜鼎在所有青铜器中的艺术地位可以与《西斯廷圣母》在美术界的艺术地位相等。我敢说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件青铜器,在东亚都是最古老、最完美的。它是独一无二,现存没有在任何一件像它。从它的尺寸上看,整个中国估计真正的只有20—25件存在,青铜的大约都只是一些小型的青

器。还从一位农民手中购入了另一件青铜器,年代比前一件要晚些。这一件是这位农民在自己地里耕种的时候所挖到的。因此,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两件青铜器,可以代表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时代。这件大的青铜鼎对宗教历史很重要,因为它是在祭祀祖先时用来给祖先煮牺牲的大锅。

为博物馆购买藏品是一个历练眼光、捕捉历史文化信息、体验文化艺术精神的绝佳机缘。劳费尔为博物馆购买藏品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许可和帮助。劳费尔也并不是个古董商人,他是一个严谨渊博的学者,并且越来越具有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品鉴力。

劳费尔的兴味一直是透过具体的人类物质制品去追寻该文化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深处。也许这可以追溯到童年劳费尔对戏剧和戏剧服饰的兴趣。以后他在日本和中国收集民间戏剧的服装、乐器和高跷,并在北美洲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木偶,包括皮影、棒木偶和几个地区风格的手套木偶,并记录蜡像表演。劳费尔收集中国各种重要的文化器物类型,青铜器、汉代陶器、石刻古玉;他似乎是在日常生活、农业、民间宗教、医学中,以及在印刷、装订、木工、搪瓷、陶瓷和玉器等工艺的实践中,作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对象的集合。劳费尔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研究案例就是经典之作,1912年2月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中国古玉》。

### 三、《中国古玉》

《中国古玉》在西方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的划时代的专著。整部书的体系布局是全新的、现代的。《中国古玉》最显著的特点,是站在现代科学学的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制作工艺、文化渊源、宗教功能、艺术特点的宏观描述、细节探讨,来充分展开能够揭示中国文化特质的、独特的玉文化。从而彻底摆脱了从宋吕大临《考古图》到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的旧式器物学、名物学。

劳费尔《导言》开始部分就讲到了现代科学的矿物学,区分了“nephrite”和“jadeite”两个概念,劳费尔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敏锐的科学意识,照亮了一些隐藏在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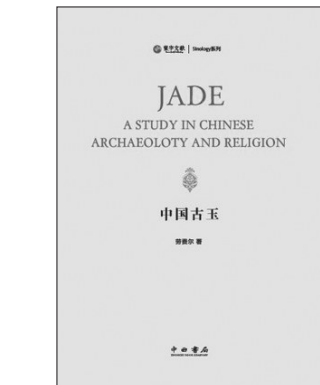
《钟天纬集》,薛毓良、刘晖祺编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248.00元

资助,学校为上海三等公学,并希望“务当力求时效,为各郡邑示以准绳”。钟天纬遵照盛宣怀“勿发议论,勿上条陈,专办三等学堂,独立一帜”的要求,致力于创办新学。

钟天纬固然不负盛宣怀所望,在教育上作出重要贡献。钟天纬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提倡普及教育;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小学教科书,开设了华文、英文、作文、算术、体操等课程;采用新法教授,使学生理解文义“有红炉点雪之妙”;制订各类章程,建立了较完整的学校管理制度。上海三等学堂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各地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钟天纬在专心办学之余,还协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主要负责选址购地,先后购地40余亩。1900年,钟天纬病逝,经友人推荐,盛宣怀同意,上海三等学堂由钟天纬儿子钟镜寰接办。由于上海电报局体制变化,资助经费减少;也由于朝廷提倡“新政”,新式学校蜂拥而起,上海三等学堂失去了引领示范的优势。1906年以后,三等学堂停办。

钟天纬的人生与盛宣怀密不可分。钟天纬最后十余年的人生轨迹是由盛宣怀圈定的,钟天纬也忠心耿耿按照盛宣怀的意愿行事。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我们从钟天纬身上可以看到盛宣怀的影子。



《中国古玉》, [美]劳费尔著, 中西书局2018年7月第一版, 398.00元

老文献边角角中的宝贵资料。比如有一种雷斧,并非是人工作品,而是自然的馈赠。古人称为雷公墨、雷斧、雷棍、雷石、霹雳等。劳费尔对这些“inkcakes”(墨石蛋糕)毫无疑问是自然产物,绝非打制石器。劳费尔相当博学地引用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相关记录。劳费尔是李时珍之后收集雷公墨资料最多的,也比林惠祥的研究早了40年。

劳费尔特别重视农作物和技术工具的传播,以及人们之间思想的互相渗透,尤其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劳费尔说有两种根本区别的文化,锄头文化(hoe-culture)和犁耕文化(plough-culture)。两种文化通常一起在相同的地域被使用,但是可以根据不同部落的使用程度来进行区分。一种方式是与我们庄园的进化密切相关的,主要例就是经典之作,1912年2月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中国古玉》。

《中国古玉》在西方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的划时代的专著。整部书的体系布局是全新的、现代的。《中国古玉》最显著的特点,是站在现代科学学的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制作工艺、文化渊源、宗教功能、艺术特点的宏观描述、细节探讨,来充分展开能够揭示中国文化特质的、独特的玉文化。从而彻底摆脱了从宋吕大临《考古图》到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的旧式器物学、名物学。

劳费尔《导言》开始部分就讲到了现代科学的矿物学,区分了“nephrite”和“jadeite”两个概念,劳费尔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敏锐的科学意识,照亮了一些隐藏在古